

诗经 末议 诗经 末议 诗经 末议 诗经 末议

韩明安
林祥征 著

诗经末议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一、关于诗经的宏观研究

历代诗经研究述略	(1)
诗经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	(16)
诗经中的爱国精神	(29)
诗经与民俗	(41)
诗经中“君子”的涵义	(53)
诗经中的爱情美学	(59)
诗经的辩证艺术	(75)
屈原与诗经	(89)
源于诗经的成语	(105)

二、对于具体诗篇的管见

《伐檀》旧说新辨	(113)
说《小雅·采薇》	(121)
《氓》诗琐笺	(133)
《郑风·溱洧》句读一得	(138)
《秦风·蒹葭》审美谈	(140)
“溯洄、溯游”新解	(149)
《陈风·月出》对意境的开拓	(152)
《陈风·泽陂》的主题	(157)
《伐檀》补注、试译、浅析	(163)
关于《王风·君子于役》	(167)

三、评价与商讨

《管锥编·诗经》学习札记·····	(177)
评《诗经探微》“国风非民歌说”·····	(204)
《诗经译注》异议·····	(222)
后记·····	(238)

历代诗经研究述略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春秋中叶编辑成书之后，一直受到后世读者的普遍重视。历代学者对它作了许许多多传、笺、注、疏。从宏观到微观，从篇章的宗旨阐述到具体的问题探讨，以至训字解词、标音绘图，进行了广泛、大量的研究工作。

远在先秦时期，虽然极少研究《诗三百》的专门著述，但是评论诗经的言论和征引诗经的文字记载却屡见不鲜。春秋时代的人们在宴会上、典礼上，在外交往来乃至日常生活中，都习惯于“断章取义”地援引《诗》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虽然谈不上研究，但是可以由此看出人们对《诗》的理解和运用。

在诸子的文章以及记录诸子言论的书籍中，也保存了不少古人对诗经的见解。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就非常重视《诗三百》的。在先秦时代，他是第一个评论诗经的人，也是一位评论得最多、最有水平的专家。他首先强调《诗》的社会政治作用。《论语·子路》篇记述他对学生们的教诲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在他看来，学《诗》而无补于内政外交，那就毫无意义了。他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里进一步强调《诗》的社会作用，并指出它的传播知识的功能。正因为他重视《诗》的这种教化作用，

他才把《诗》选来作为弟子的教材。

关于孔子删《诗》与否的问题，自古众说纷纭，多数人的意见倾向于：孔子至少是对《诗三百》作过一些文字加工和乐谱调整的工作的。孔子的诗论在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他对诗经的政治作用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部诗歌总集本身的特征，成为儒家传统诗教中最积极的部分。

战国时代的孟轲对诗经的研究也是有很深的功夫的。据统计，《孟子》七篇引《诗》多达30余处。千百年来影响最大的观点是他提出的“以意逆志”的解《诗》主张。所谓“以意逆志”，就是“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这里的“文”指诗的形式，“辞”指诗的内容。他认为研究诗经的人不可拘泥于诗篇的文笔，从字义表面上去机械地理解诗的内容，也不应该只满足于对内容的表面理解，而要在这种对内容理解的基础上，再通过自己的体会去推测或探索作者在诗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这种“以意逆志”的方法尽管较之春秋时“断章取义”的解诗、用诗风习有一定的进步，但从孟轲本人解诗的实践看，它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常常把主观上的“意”染上阶级的色彩。孟子在说《诗》上，进一步强调要“知人论事”。他在《万章篇》中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他强调读古人的诗要了解他们的为人和他们的时代，这是理解诗必不可少的条件。孟子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不能指出怎样才能做到“知人论世”，因而他本人读《诗》也未能达到“知人论世”的地步。

荀卿也多次论及诗经的特点和功用。《荀子》一书，凡

32章，其中论《诗》7处，引《诗》81处。荀卿认为《诗》中表述的都是圣人之志，体现了圣人之道，因而应当成为著书立论的根据，这就是他的“明道”的观点，但是他又认为，由于诗篇内容讲的是古代的事情，不一定直接切合当前的实际，因而学习它就要择师和崇礼，否则就只能学到些皮毛而已。他还认为《诗三百》是天地间声调和谐的楷模，《诗三百》的本质内容则是礼义之文。他习惯于引《诗》证事、证论，常在发表个人议论之后，征引具体诗句，来证明或加强自己的论点，这体现了征圣和宗经的主张。和春秋时各国君臣一样，荀卿引《诗》、用《诗》的作法，也没有摆脱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的习气。据考证，《诗》、《礼》、《易》、《春秋》诸经多是荀子传下来的。有人说俞樾辑有《荀子诗说》一卷，惜未之见。

儒家而外，《墨子》、《庄子》、《吕览》、《韩非》诸书中亦不乏论《诗》的文字。墨家对《诗三百》更为系统的论述，连同他们所依据的诗文一起，于秦火后失传。而《吕氏春秋》论《诗》的文字又每与正统儒家的诗说相去甚远，常被斥为异端邪说，因而未引起后世传《诗》的儒生的重视。

到了汉代，一些先秦古籍陆续出现。《诗三百》因为是先秦士大夫的必读课本，“讽诵不赖竹帛”（《汉书·艺文志》），所以能较其他经书更完整、更迅速地搜集整理起来。汉初传授、研究《诗三百》的有鲁、齐、韩、毛四家。

鲁诗是鲁人申培所传。《汉书·儒林传》和《汉书·艺文志》说他受诗于荀卿弟子浮丘伯，著有《鲁故》25卷、《鲁说》28卷。后来研究鲁诗的又分成“韦氏学”、“许氏学”以及“张、唐、褚氏学”等不同学派，并于武帝

时立于学官。鲁诗亡于西晋，其遗说散见于《史记》、《说苑》、《新序》、《烈女传》诸书中。

齐诗是齐人轅固生所传。《汉书·儒林传》说：“齐之言诗者皆本诸固，一时以诗贵显，悉其弟子也，而夏侯始昌最明。始昌授后苍，撰《齐诗故》及《后氏诗传》。”齐诗立学官后，先后出现“翼氏学”、“匡氏学”、“师氏学”

“伏氏学”等不同学派，著述有《齐后氏故》39卷，《齐孙氏传》28卷、《齐杂记》18卷。郑玄、班固、桓宽等皆其弟子。齐诗亡于魏，其遗说见于《汉书》、《仪礼》、《礼记》及《盐铁论》诸书。

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韩婴作《内传》四卷、《外传》六卷。研究韩诗的有“王、食、长孙”之学。著述有《韩说》40卷、《韩故》36卷以及《薛君章句》、《韩诗章句》等。后人所作类书，引《诗》多据韩诗。韩诗亦于西汉立学官，亡于宋。

毛诗虽未立学官，但一直在私相传授。《汉书·儒林传》说毛公授贯长卿，长卿授徐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逐渐出现了郑众、贾逵、卫宏、马融等知名学者，皆有著述传世。《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毛诗》29卷、《毛诗故训传》30卷。及至郑玄为毛诗作笺之后，毛诗更为盛行，广为流传。汉代的诗学，无论是用隶书写就的今文三家诗，还是用籀文写就的古文毛诗，都是汉代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当时认识的基础上，对《诗三百》所作的解释和论述。这些经学家们从未认为《诗三百》是文学作品，而一直把它们作为经学来研究。为了取悦汉朝统治者，抬高自己诗学的可信度，他们极力从《春秋》、杂说中寻找

材料，拿来和一些诗篇相联系，甚至不惜歪曲诗文原意，去搞牵强附会，对每一首诗的解释都能附会在一件事或一个历史人物身上，非美即刺，再无别说。

魏晋以降，毛诗愈益昌盛显赫，逐渐取得了独霸的地位，出现了王肃、王基、陆玕、郭璞、陆德明、孔颖达这样一些专家学者。他们总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大体上是对《诗序》、《毛传》、《郑笺》的承袭。虽然魏晋时期出现过非郑、申郑的争议，但是并没有动摇《郑笺》的地位。当时以王肃为首的一派标榜纯古文学，创立王学。他们以《毛诗奏事》、《毛诗义驳》以及孙毓的《毛诗异同评》等论著驳郑申毛，排斥三家诗说。以王基为首的陈统、刘璠等人，则以《毛诗申郑义》、《毛诗义》、《毛诗传笺是非》、《难孙氏毛诗评》等论著，对《郑笺》进行捍卫。结果《毛传》、《郑笺》并行如故。南北朝时期的南北诗学之争也持续了数十年。《隋书·儒林传》云：“南学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北朝诗学基本上固守郑玄成说，一成不变，他们是王基学派的继承者，主要学者沈重、刘献之等；南学的代表人物为何胤、崔灵恩等。他们论争的焦点仍然是如何对待《郑笺》的问题。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他们的研究成果尽收入唐人的《毛诗正义》之中。自魏晋迄五代的700余年中，在诗经研究领域里毛、郑地位没有大的波动。及至孔颖达等作《毛诗正义》之后，《毛传》、《郑笺》的地位更趋巩固了。

孔颖达在宗毛准郑的总原则下，在诗经研究中的某些重大问题上，也作出了一些新的建树，修补了汉学的错漏，促进了诗经研究的发展。比如他对诗经六义的解释，就颇有可

取之处。他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究竟是什么样的“异体”、“异辞”呢？他进而解释道：“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这里他把风雅颂看作诗体的差别，把赋比兴看作不同的表现手法，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它纠正了郑玄以来一直把诗经之义放在“美、刺”范围内进行解释，并按“美、刺”的原则进行分类的陈腐作法。孔颖达等的《毛诗正义》是一部官方组织撰写的，体例完整、规模浩大的研究专著，它标志着唐代诗经研究的水平，它是对汉学诗经研究遗产的继承和补充。

陆德明也是唐代的一位鸿儒。他的《经典释文》总结了汉魏以来文字音训的研究成果，是继《说文解字》之后的一部大型语言学著作。书中对诗经的文字作了简明的音切和训义，收编于《毛诗正义》之中，独成一体，把诗经学的训诂学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上。

唐代诗经研究成果中，除《毛诗正义》及《经典释文》中的《毛诗释义》之外，尚值一提的是成伯玑的《毛诗指说》。全书略分兴述、解说、传授、文体四篇，对诗篇的字词句章乃至修辞，均有论述。特别是成伯玑发现《小序》用语重复，且格调不同，因而判定它非一人所作。这对苏辙、周孚、吕祖谦等人对《序》取首句的观点不无影响。据注录，自汉迄唐，研究诗经的专著约120余部。如今，这些书大都散佚失传，有目无书了。

宋代的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在诗经研究领域中也一再出现“离经叛道”的思潮。这主要表现在对《诗序》、《毛传》、《郑笺》的怀疑上。以欧阳修、苏辙为代表的学者，

首先指出了《序》、《传》、《笺》之间的矛盾。欧阳修在其《诗本义》第15卷《诗解统序》中说：“毛郑二学，其说炽，辞辩固已广博，然不合于经者亦不少，或失于疏略，或失于谬妄。”“至于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驺虞》尤甚，特不可以为信。疑此二篇之序为讲师以己说汨之，不然安得谬论之如此也。”欧阳修对毛郑穿凿附会之说逐一辨驳，很多观点合情入理，为后代研究者所推重，以至不赞成他的观点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者对他也不得不评论说：“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义。”现代学者郑振铎也说：“宋代疑古之风，实此书启其端。”①

苏辙也是北宋学者中怀疑《序》说的最早的一位。他继承了（也许是不谋而合）唐代成伯玕的观点，对《小序》说诗只取首句，认为首句以下皆为演绎之文，“其言时有反复烦重，类非一人之词者，凡此皆毛氏之学，而卫宏之所集录也。”因而，他常对首句以下的文字进行辩难。他的这种见解对当代和后来的学者影响很大，甚至包括周孚、吕祖谦这样一些宗毛准《序》的人，在苦无退路时，也不得不赞同他的论断。可惜他的《诗经传》除少量明刊本之外，近代尚无其他版本，因而没有能广泛地流传。

继欧阳修、苏辙之后，南宋学者郑樵对《诗序》、《毛传》、《郑笺》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抨击和全面的否定。他的《诗辨妄》（原书已散佚，有顾颉刚先生辑本传世）是攻驳《毛诗》的一部史无前例的诗学研究专著。在《传笺辨》一节中，认为毛、郑不过是“村里陋儒”，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乱先王之典籍而纷惑其说，使后学不知大道之本，自汉儒

①《关于诗经研究的重要书籍介绍》，载《小说月报》1923年14卷第3期。

始。”郑樵的观点“勇往而少检点，错误的地方自然也有，但他见到的大体自然不错的。”^①特别是他对先师、先哲们的怀疑精神和起而驳难的勇气，不能不令人赞叹。

在郑樵的影响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也改变了最初遵《序》治诗的立场，对《序》说产生了全面的怀疑，并在其《诗序辨说》中发挥了郑樵的某些观点，对《序》文进行了较为彻底的驳难。他的《诗集传》尽管还没有摆脱卫道的立场，仍然反对“乱伦悖理”，倡导“温柔敦厚”，却能别开生面地以文学的眼光看待《诗三百》，在反复玩味诗文的基础上，提出许多与汉儒观点截然相背的论断。他在《诗传遗说》中指出：“诗可以兴，且须反复读，使书与人相乳入，自然有感发处。”又说：“《摽有梅》诗，女子自言婚姻之事如此，看来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言。”这些见解较之汉唐诗说，是一大进步。朱熹堪称宋代诗经研究之集大成者。他的《诗集传》代表了宋代诗经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元、明两代，乃至清初，取毛郑而代之，成为了学《诗》、论《诗》必须参照、遵循的范本。

在南宋，除郑樵、朱熹而外，怀疑并抨击《诗序》的主要人物中还有王质、杨简、辅广、程大昌、陈鹏飞等人，他们构成了一派冲决旧说的新势力。王质在其《诗总闻》中以《左氏》与《诗序》相对照，有力地证实了《序》说之妄，进而主张说诗必须首先废《序》，并在此基础上独立门户，对许多篇章的解释都提出了惊俗的见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南宋之初，废《序》者三家，郑樵、朱子及质也。郑、朱之说最著，亦最与当代相辨难。质说不字字诋

^①顾颉刚：《〈非诗辨妄〉跋》，见朴社民国22年版《诗辨妄》。

《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别出心裁，坚锐之气乃视二家为加倍。”杨简疑古的勇气不亚于郑樵和王质诸人。他攻《诗序》、攻郑康成、陆德明；认为《尔雅》多误，《左传》亦不足据。他在20卷《慈湖诗传》中提出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对后世的研究者颇多影响。辅广的《诗童子问》则极力支持朱熹的观点而掊击《诗序》。在许多细微处发明、补充了《诗集传》的观点，成为其有力的声援者。程大昌的《诗论》虽然篇幅不多，却也是宋代诗经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论述的主要问题是风雅颂的分类体制、二南与雅颂以乐得名的根据，以及诗经《大序》、《小序》的谬误、乖戾之点。他对这几个问题的观点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认为二南之外的13国风都不是入乐的诗篇，未免失之偏颇。

北宋卫《序》的一派人物，如王安石、程颐等，一味地抬高《诗序》的地位。或以为它们是“国史”，是“圣人自记”，或以为是“圣人所述”。王安石甚至主张“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只凭“圣人自记”的序文来理解诗篇就够了。这些论调虽然是针对欧阳修、苏辙而发，然而那语气是比较含蓄、温和的，这或许是由于欧阳、苏二位都是当代文坛上鼎鼎大名的人物的缘故；而在南宋，卫《序》的人对郑樵的攻击却是不遗余力的，其代表人物当推周孚、范处义等。

周孚在其《非诗辨妄》的“自序”中表明自己的写作意图说：“自汉以来，六经之纲维具矣，学者世相传之，虽圣人起，未易废也。而郑子乃欲尽废，此予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可是通观其2000余言《非诗辨妄》，除了表现出明显

的成见、意气外，多属答非所问的搪塞之语，并没能从根本上将郑樵驳倒，它的存在的价值主要在于它引录了许多郑樵的原话、原意，使后人由此得窥《诗辨妄》之一斑。

范处义也是南宋时少数几个遵《序》治《诗》的代表人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到他时评论说：“盖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郑樵，最遵《序》者则处义矣。”范处义也象程颐、王安石一样，认为《诗序》是“国史及作诗者之本意”，并且“间有圣人之遗言”。他在《诗补传》“自序”中说自己治诗“以序为据，兼取诸家之长。”实际上，他的《诗补传》中所选取的只不过是那些附会《诗序》之语罢了。

以吕祖谦为首的一派，包括段昌宗、严粲等人，他们宣言超脱门户之见，公允地采纳各家之长，但实际上仍属那种稳健中不免陈腐的“宗毛派”。《家塾读诗记》中很多观点都参照、采纳了朱熹早年之说，待朱熹弃旧图新改变观点后，它“反而不能不疑于其间”了。

宋代的诗经研究成果在数量上也是惊人的。按《宋史·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补》所载，研究专著几近百部，凡1300余卷，差不多相当于自汉迄唐乃至五代1000多年间所产生的专著的总和。可惜这近百部非汉疑唐、废序难笺、别出新义的论《诗》专著，已大半亡佚而未得传世。

元代的学者，除马端临、许倬等继续维护《传》、《笺》、《序》外，其他人论《诗》大都以《诗集传》为准则。朱熹解说诗经的影响，时间既久，范围也广。元、明两代多次科举考试科目中的诗经部分，都是指定《诗集传》为主要参考书的。清代康熙间编辑的《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也

是以《诗集传》为“蓝本”的。

明初仍沿袭元代学风，治诗绝对崇尚《诗集传》，朱熹被奉为神圣。一些有影响的著述，如朱善的《毛诗解颐》、胡广的《诗集传大全》、梁益的《诗传旁通》等，多主《诗集传》说。及至李先芳的《读书私记》出，形势为之一变，许多学《诗》、治《诗》者，始闻汉学。《读书私记》说诗观点折衷于毛、郑、吕祖谦、严粲之间，议论平和而无门户之见。随后持折衷见解的专著陆续问世，如张次仲的《待轩记》（折衷于毛、朱中间）、姚舜牧的《诗经疑问》（兼及毛、朱、严，亦有新论）、朱谋玮的《诗故》（主汉学，与《诗集传》多所不同）、郝敬的《毛诗原解》（攻朱熹说，于《序》取首句）等，一时间各派并起，蔚为大观，但其见解均未超出毛、朱。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丰坊，他伪托古人自撰了不少专书，提出了不少有胆识的见解，如更动诗篇，串移章句，进行新的解释等。历来治诗者多指责他行径的卑劣，殊不知这种伪托方法正能使他从容跳出毛、朱范围，随心所欲地发挥自己的观点。他的解说在当代和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同代学者凌濛初、张以诚等人，对他笃信不疑。

宋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诗经研究精神，在有清一代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出现了一些既不依傍《诗序》亦不投靠《诗集传》的善于独立思考的学者。如姚际恒、崔述、方玉润、储锦、惠周惕等。他们善于通过古代文献、史实的考据，探求诗篇及章句的本义，提出自己的新见。

清代的另一派诗经研究专家是以长于解释字句见称的陈启源、胡承珙、马瑞辰、陈奂等人。他们悉心考释字句，旁征博引，显露了小学家的训诂功夫，并能大体上做到“言有

新义，语有所本”，而其所遵循的思想体系，则仍在毛郑之间。如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等。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则致力于从声韵、训诂名物等方面阐发毛诗本义，为毛诗立下大功，堪称历代训诂考据的集大成者，对近代学者研究诗经提供了不少方便。

对已散佚的鲁、齐、韩三家诗的重新搜集和进一步整理，是清代诗经研究的另一重要成绩。继清初学者范家相及卢文弨之后，清中叶学人陈寿祺更在前人辑录基础上对三家诗作了集中的搜集、考订工作，可惜他编著《三家诗遗说考》未竟而逝世。其子陈乔枬继而完成《鲁诗遗说考》、《齐诗遗说考》、《韩诗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正》、《鲁齐韩毛四家诗异文考》等专著，凡22卷。清末王先谦集各家资料及观点的大成，著《诗三家义集疏》，使后世学者得窥三家诗总貌。致力于三家诗研究的清代学者还有徐、陈士珂、周廷案、钱世叙、阮元、宋锦初、顾震福、龚自珍等。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也分别收入了《鲁诗故》、《齐诗传》、《韩诗故》、《齐诗翼氏学》、《韩诗内传》、《韩诗章句》等书，对于保存三家诗有一定功绩（也有人认为此书为山阴章宗源辑，马氏攘为己有）。魏源《诗古微》虽宗三家而刺毛诗，然在具体问题的判别上，也颇有独到见解，如认为《商颂》是周代的祭祀诗，就很有见地。

清代诗经研究总的形势是：结束了宋明以来朱熹《集传》的统治地位；汉学潮流重又回升；三家诗的研究有新的发展；音韵、考据功夫较前有长足进步。

“五四”以来，一些学者在科学、民主精神的指导下，对诗经旧说深表怀疑，批判了腐儒们对诗经的歪曲，使诗经研

究彻底摆脱了门户之见和封建说教的束缚，写出了不少专书、专论，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诗经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期间，成果较多，贡献较大者，应首推闻一多先生。他主张用社会学的观念去读诗，用考古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的方法“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去探索诗篇本来的内容。特别批评前人没有把《诗》当作文学作品来对待，如他在《匡斋尺牍》之六（收于《神话与诗》一书中，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中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经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把它当文艺看呢！”这段话既批评了研究诗经的古法，也讽刺了研究诗经的洋法，观点自是不错的，只是把一部诗经说成“一部歌谣集”是有欠准确的，因为诗经中还包括着国风以外的将近半数的雅颂篇章，它们多不是歌谣。他在《选诗与校笺》一书中曾拟定了一个重新编订、注释诗经的提纲，把15国风的160篇诗按内容编次为《国风类钞》，逐一重新注释，惜未成。他的《诗经通义》对二南和邶风中的30首诗进行了悉心地研讨，逐字、逐句地指出《毛传》、《郑笺》的谬误及其相互间的矛盾。《诗经新义》则对二南诗篇中常见的字词进行类比和解说，其观点亦与《传》、《笺》大相径庭。

闻一多的《古典新义》一书中除包括了《新义》、《通义》两部分说《诗》的内容外，还单列了一篇轰动一时的《〈诗·新台〉鸿字说》。作者通过仔细地考索，认为“鸿”字即“苦蛰”二字的合音，从而解决了“鱼网之设，鸿则离之”

这一前人困惑莫解却又避而不谈的疑难。此说至今为后人所推重、叫绝，曾被誉为“诗经研究中的一大发明”（高亨语）。

在现代诗经研究中，成绩卓著的还有郭沫若先生。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为诗经研究开拓了新境。几千年来的诗经研究大都在立经、解经、非经、卫经、补经中讨生活，都没有离开一个为研究而研究的目的。作为历史学家，郭沫若首先看重的是诗经的史料价值。他的文章《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是一篇运用经书及甲骨文、金文，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取得成效的典范。文中充分显现了作者对诗经的正确理解。作为文学家，郭沫若首先断定诗经国风大部分是民歌，其中不少优美的情歌。他不急于同汉代经学家争辩这些是不是“美教化”的颂歌，也不屑于与宋代的理学家、清代的考据家商量，这些究竟是“淫诗”还是刺淫奔的诗，而是独出心裁地选定40篇优美的诗歌（郑风竟有14篇）拿来译成白话，向广大的民众去普及，让他们了解我们民族珍美的文学遗产，给他们以美的享受。他在《卷耳集·序》中说：“我们的民族，原来是极自由极优美的民族。可惜束缚在几千年来礼教的桎梏之下，简直成了一头死象的木乃伊了。可怜！可怜！可怜我们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也早变成了化石。我要向这化石吹嘘些生命进去，我想把这木乃伊的死象苏活转来。”他认为“《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这是既明的事实。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迷恋，也值不得我们去批评。我们当今的急务，是在从古诗中直接去感受它的真美，不在与迂腐的古儒作无聊的讼辩。”（《卷耳集·自跋》）《卷耳集》既冲击了复古派的